

汉译译者谭

张祥龙：“它激发我去理解中国哲学中神秘体验的向度”

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蜚声世界的张祥龙，认为在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中，纵然学习和谈论过再多的哲学思想，但总是感觉到“意犹未尽”，直到他“遇到”了比利时神秘体验论（神秘主义），以及它的代表人物吕斯布鲁克及其经典著作《精神的婚恋》。“翻译这本书（《精神的婚恋》）在我学术生涯中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现象学也好，中国哲学也好，我别的东西都学了很多，讲了很多，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未尽在哪儿？就是最终最原发的那个东西，没有讲出来。从现象学和中国哲学里，我所体验的那些思想，还是没有点到这个‘睛’。”张祥龙说，这本书的翻译让他受益不少，“起码是跟我追求的学术理想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呼应起来了，它激发我去理解中国哲学中神秘体验的向度。”

1992年9月，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辞世，作为私淑弟子的张祥龙写下《我与贺麟先生的师生缘》一文，深情纪念自己的这位哲学启蒙导师。上世纪70年代中期，青年时代的张祥龙跟随贺麟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这本书给他带来深刻个人体验的著作，成为他哲学启蒙之书。而当年读《伦理学》获得的神秘体验，在20多年后读吕斯布鲁克的著作时不期然地再次相遇。“当年我读《伦理学》时就有这种神秘体验的维度，虽然在表达上非常理性，但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人对神的爱。有人认为是完全理性化的，是斯多亚主义的现代版，但我读出来的斯宾诺莎，那种人对神的爱不是抽象的，所以我接触到吕斯布鲁克的时候，就有所感应。”

1997年，张祥龙受北大哲学系委派去比利时进行学术交流。同行的学者中，有人去了鲁汶大学，他去了安特卫普大学的吕斯布鲁克研究所，这成为开启他认识吕斯布鲁克的一个契机。虽然鲁汶大学的名气大些，但他觉得以自己的性格，以及后来他和吕斯布鲁克的著作结缘，以此了解西方整个基督教神秘体验论的特征，去安特卫普倒是更为合适。在安特卫普，张祥龙深入地研读了吕斯布鲁克其著作，研究所还派了他们最好的专家、国际知名的研究神秘体验论（国内翻译成神秘主义）学者莫马

子教授专门来辅导他。莫马子是个很有意思的人，非常热情，经常请张祥龙去他家喝葡萄酒，说研究神秘主义，就是要喝酒，这样精神上才能体会到一种沉醉，进入神秘体验的境界。

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之一，而神秘主义/神秘体验论实际上是基督教真正的源头。张祥龙认为，其实全世界人类群体的开创者都可能有过神秘体验，但是基督教的神秘体验论，特点是强调神人之爱，也就是神对人的爱和对神的爱，尤其是对神的爱，如何经验到，如何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从12世纪开始，西方世界就出现一股爱的神秘体验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宗教学说只是其在形式，其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精神上的内在交融。时风所及，不仅仅在比利时，包括现在的荷兰、甚至德国法国的一些地方，整个这些低地国家，还出现过beguines（女自修士）的运动。吕斯布鲁克研究所所长德·巴赫知识渊博，人也特别好，经常带他去参观这个流派的一些历史遗迹，还向他展示相关的藏书手稿，其中有些是中世纪甚至更早些的羊皮纸手抄本，非常珍贵。理论阅读，感性的游历，参观，所有这些，让张祥龙对神秘体验运动有了一种现场经历。

基督教神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理解基督教或基督教神学，除了其（尽量）理性化和体系化的学说以外，还有它们所源出的终极体验，否则，对基督教的理解是残缺的，大而言之，对西方文明的精神的领会也是不全面的。出于这种考虑，张祥龙决定把他在安特卫普大学学习接触到的西方神秘体验论介绍给国内学界，这一来，自然要从吕斯布鲁克的著作——尤其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的婚恋》——着手。“洋务运动以后我们引入西方思潮，主要介绍科学技术，当然后来也涉及到文化、宗教和哲学。但在引入基督教的时候，基本上是从唯名论、唯实论这些主流学说切入，其实像奥古斯丁，他本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秘体验论者，他接受的是普罗提诺，如果不了解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

为此，张祥龙后来曾邀请几位比利时的有关学者来北大访问交



张祥龙

流，他当时还计划组织翻译一批神秘体验论的著作，初步列好了二三十本书目，他的规划，是将这个系列做成一个体系，不光是基督教，东方的神秘体验论方面的书也可以收进来。好几家知名的出版社对这套房书很看好，纷纷向他表示合作意向。但这个计划终究未能圆满地完成。

张祥龙列出的书目里，有好几本是吕斯布鲁克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本后来收入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精神的婚恋》。“这本书全世界有很多译本，有的译本，比如说英译本，就有好几种。中国学术界介绍得比较晚，所以我就有这个心思，既然没法系统地介绍，作为单本翻译，我想还是有可能的，将来有出版社愿意出，就更好。但是因为当时很忙，就把这事放下了。”

新的契机是，2011年，张祥龙有机会再度访问安特卫普大学，和第一次去的时候吕斯布鲁克研究所冷冷清清不同，这次他发现西方一些大学对神秘体验论很感兴趣，不少学者来此访问交流，其中包括来自哈佛、牛津这些一流大学的中青年学者。这次，张祥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精神的婚恋》翻译出来。这期间，跟德·巴赫的接触特别多，翻译一遇到困难就请教担任《吕斯布鲁克全集》主编的这

跟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体验的经验相互对比，相互引发，中国这方面资源其实很丰富，但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往往忽略这一要害。道家，像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终极性神秘体验。庄子更是如此，《逍遥游》一篇，实际上是隐喻一个人的精神升华到一种自由的境界，把小我都忘了，和一种更高的力量融为一体。至于儒家，有时候一谈儒家的神秘体验，就说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这毫无疑问是他的神秘体验。但实际上孔子也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对音乐的爱，也是一种神秘体验。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周敦颐讲“孔颜之乐”，启发了二程，不过这种神秘体验的维度较多地被心学派继承下来。“跟西方相互印证，我们的研究能多一个维度，可能会更意思。”张祥龙说。

20世纪以来，中国译介西方著作出现过两个高潮，一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是改革开放以后。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二个高潮的延续期。但时代不同，翻译也会随之发生生变化，也即翻译和时代思潮紧密相关。张祥龙拿上世纪初著名的《天演论》为例。“实际上严复的翻译很不严格，几乎算不上真正的翻译，只是一种选译，再加大量自己的看法，而且他的看法与作者赫胥黎的思想还有矛盾，他接受的更多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而赫胥黎恰恰是认为社会演化不能全靠竞争斗智的力量。”这本书的原名叫Evolution and Ethics（演化与伦理学），赫胥黎认为，人类的进化有其独特性，伦理是进化中重要的因素。严复推崇物竞天择，把自然界生物进化论的理论想当然地套到人类身上，根本没有考虑伦理的和长时间的因素。其时中国

遭受列强侵略，积贫积弱，正在寻求应对的捷径，虽然严复的翻译非常主观、片面，但这一口号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风潮，所以译本一出来，无论左派右派，全国上下一致叫好，觉得茅塞顿开。“很少有译著能产生这么大的历史影响。”在张祥龙看来，《天演论》是幸运的（尽管其后果中隐藏着不幸）。当然，也不光是《天演论》，后来很多的译著，对我们的思想界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波译介高潮走的全盘西化路线，第二波一开始也是全盘西化，但时代更迭，现在已经大为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张祥龙在北大读书，当时的翻译和介绍完全以西方为范式。1992年，他从美国博士毕业进北大教书，开设的海德格尔课和现象学课特别受欢迎，但张祥龙的研究视角是中西比较，当他讲到中国哲学时，学生们有的很反感，甚至跟他争论。这几年，一些当年的学生对他讲：真后悔当年没能好好听您的课。

好眼下，对译者，除了文字语言水平，对作者背景的了解，理解的深入，还有对译者学养上以及思想见地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年，他的朋友、同事中开始以融通中西的思路在翻译、介绍和阐发，比如倪梁康将胡塞尔研究和王阳明心学结合起来，韩林合搞分析哲学，同时还研究庄子。“我能看到这个时代潮流变化，感到很欣慰，这也恰恰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张祥龙一直主张，不能以西方的学术范式为唯一标准，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东西方文明和思想。和西方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现在也开始慢慢拉近了，但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谁高谁低，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我们有自己的范式，怎么能用西方的范式来衡量全世界所有的学说？应该以一种平等互补的思路来引进，所以说不仅是翻译过来就行了，还要让中国人懂，能让中国人产生某种感应。“就像当年玄奘翻译的《心经》，真是译得好，既准确，语言又美。”张祥龙补充说。

前些年，退休后的张祥龙先后在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教学，这两年因为身体有些恙，他回掉了一些大学的邀请。他说自己“思路总是不老实”，希望能闭门在家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除了专业阅读，张祥龙平时还特别爱看俄罗斯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近十几年他一直在订阅《环球科学》杂志，对人工智能、量子力学这些领域的话题都很感兴趣，并为此耗去不少精力。“但是我值得值得，因为哲学对我来讲，不是一个体系的东西，而是要有内在的趣味。有新东西，而且是一种根本性的开启性的东西。”

（本报记者陈霞霞采访整理）

“倚马可待”的吴野

■徐廷华

很早就想写写作家、诗人吴野老师。2019年初春，他从澳大利亚回国探亲，特地请了王德安、王慧琪和我四人在近郊桥附近的一家茶社小聚，相谈甚欢。并约定明年再聚首。哪想到2020年初，一场新冠疫情全球流行，至今仍肆虐，关山阻隔，难以相见，只能在微信朋友圈里，偶遇音讯。

与吴野老师相识很早。1979年原《南京文艺》改刊《青春》，我们就相识了，那时他是该刊的诗歌兼散文编辑，几年后荣升副主编。我那时受聘该刊的室外编辑，常有见面的机会，其实再早在十多年前，我就频频在报章上闻其“诗声”，但不识其人，空怀一腔敬佩之情。

吴野老师确有写诗的天赋，且以“快手”（构思快、出手快）“倚马可待”驰名诗坛。听一位老诗人讲过一个他写诗的故事。有一年《江苏工人报》策划了一个专版，其中有一个专题是一位版画家将毛泽东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丰功伟绩刻了12幅木刻版画。发排那天，主编觉得用文字表述这12幅版画不如给每幅版画配一首诗，来得更形象生动。主意一定，报社立即请来南京几位颇有名气的诗人赶来急就。大家看了一遍画，一个个摇头，觉得时间太紧，很难写。这时吴野眨眨眼睛（这是他个习惯动作），频频眨眼睛之间一个点子就想出来了！自告奋勇地全部揽下，大家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担心他在那么短的几小时，一下子要写出12首，且首首不能重复，真的很困难。

那天晚上，吴野不知躲到哪个编辑部房间写诗，已是深夜一点了，还不见他将诗稿送来，值班总编辑焦急万分，眼看着报纸印在即，总不能不开“天窗”啊。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相顾期盼中，吴野拿着他写好的诗悠闲地来了。大家围上去一看，夜深人静的编辑部顿时惊涛拍岸，地动山摇，赞不绝口，无人不佩服。吴野写的这12首诗，每首十行（四二二节），立意新、角度新，没有一句重复。总编当即拍板一字不改就编辑上版。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那以后吴野“倚马可待”的诗名大震，诗人圈无人不知。其实吴野自己对写诗是有底气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的工业诗就颇具影响力。以后，报社慧眼识珠，立即将吴野从南京南化公司第二中学调任《江苏工人报》工作，几年后吴野又到《新华日报》城市组主持工作，再后来就到了《青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像水落进海里，一滴水滴落着一条河流淌，全身心地融入培养文学新人和他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中去。我和他的交往也逐渐多起来。

2015年我撰写《忆上世纪五六十代南京工人诗人群》一文时，列出的南京五位写工业题材的诗人中，吴野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另几位是朱兆第、王德安、叶瑞端、蔡之湘）。那段日子，当我梳理吴野老师的创作成就时，他的代表作一一映入眼帘：长篇抒情诗《孙中山》《南京颂》，长篇小说《秦淮恨》，文学理论

集《作家之门》，报告文学集《画家萧平传》等等，没有一部不叫好。每一部都引起文坛的轰动效应，特别是他的两部长诗，震惊文学圈。他的不少作品还多次获南京市委“五个一”工程奖，并被国外报刊转载和选编入中学教材。我最心仪的是他后来出版的自传体报告文学《国府路上的吴家宅》。这本传记文学不仅记叙了作者祖居南京老宅的起源及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还详述了吴家宅繁衍的历史脉络、曲折丰富的社会经历，以及对新中国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多的是记叙作者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人生轨迹。

当我写完工人诗人群拙作，送请王德安老师并转吴野老师指正，吴野从万里外的澳大利亚发来短信，他在微信中说：

廷华文友，你好！在地球这边，同样，浮躁占据了主席台，诗歌没有席位，没有话筒，缺乏诗的审美情趣。你真实切切的感情，实实在在评述，再现了那个年代，那个另一种青春情态。文中，我那几个诗兄弟的肖像画惟妙惟肖。你居然能能将各人的作品完整收集，不容易，很下功夫。对我也有勉励，高山流水，知音情深，向你表示谢意，也向你表示敬意。你比我们年轻，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祝你创作丰收！

吴野 2017.9.16

读着吴野老师的复信，往年和他相处的情景一一浮现，心潮起伏。生命的弦，让我一直在关注着

这位江苏文坛著名的作家、诗人。2021年南京市工人文化宫成立70周年，拟编一套丛书（诗歌、征文、书画摄影），反映南京工人的创作实力，聊以纪念。其中的一本专著是选编南京工人创作的工业题材的诗歌。我和执行主编王德安老师先拉出了南京工人诗人的骨干名单，逐个联系落实。

我想起吴野老师1965年11月参加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时，时年24岁的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赴京前夕，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首《明朝上北京》的诗。后来这首诗选入新中国成立的《江苏30年诗选》中。我提出了这一条目。王德安老师毕竟是老诗人，凭他惊人的记忆力对我说，吴野1964或1965年在江苏《雨花》发表过一首《化肥工人致煤炭工人》的诗，诗的背景是南化公司的吴野致徐州贾汪煤矿的诗人孙友田（全国著名煤矿诗人），他们都曾一同参加这个盛会，选这首诗更有代表性。

那几天我跑了市里几家图书馆，翻阅早年出版的《雨花》杂志，一本接一本，一页连一页，终于在1964年的第5期《雨花》上找到了这首诗。诗写得确实好：

你的手 抚摸着深邃的地心，
采集那蕴藏热与火的块块黄金；
我把手 伸向地表和云层，
用长江浪 也用大气制造肥田粉。
贾汪煤 在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

就像劲头十足的矿工 满身热气腾腾！
我们的化肥顺风飞遍全国，
到哪里 就打开哪里谷仓的大门！
——你挖掘的是工业的粮食，
——我制造的是农业的营养品。
每当火车载煤来 我想起你火热的劳动，
每当轮船运肥去 你该闻见粮食的芳香！
如果说：祖国是一架威力强大的机器，
那我们是两颗和得牢牢的齿轮！
你的岗位是巷道 我成年守着水泵，
我们都在向祖国奉献忠诚！
你爱谈煤 我爱谈化肥，
骄傲地夸耀：这就是我们闪光的青春！
立在水洗塔下 我听见矿山礼炮，
站在厂门口 我望见你旋转的天轮；
你咚咚震响大地的炮声是祝捷的战鼓，
我呜呜鸣唱的汽笛是军号吹红了九天云！
如果说我的汽笛你的炮声在遥相呼应，
这是我们心里交流着的冲天豪情。
如果说我的汽笛你的炮声在纵情欢唱，
第一支凯歌 献给她：北京！
北京！……

几十年后，读这样的诗仍能让人心中涌起一种自豪、一种骄傲。我立即将诗拍下来，发给王德安老师。王老师立即回复，就是这首最好。据说，当年孙友田看了这首诗，举起橄榄枝，立即回应了一首《煤矿工人致化肥工人》，发表在下一期的《雨花》上，遂成江苏诗坛一段佳话。

这几年来身居国外的吴野老师（他们夫妻俩居住儿子儿媳处）除了在“南京青春文学院”群里，和文朋诗友微信聊天，晒新作、发图片，还一直关注着《扬子晚报》上的《诗风周刊》，时有新作见报。他在用这一方式，告诉文友们，他还念着祖国，还想着朋友们，虽居海外，却近在咫尺。一次在内蒙古草原旅游的王德安老师，得知吴野在《诗风周刊》又发一首新诗，发微信给我，要我赶紧去买一份当天的《扬子晚报》，说上面有吴野的新诗。我到报亭时，报摊主人说报纸已过了好几天，但却挺热心，他从早几天的旧报中侥幸找出一份。我就立即在报亭摊开报纸拍下吴野的这首诗，先用微信发给王德安，让他放心，所托事情已办妥。

前些时，我又看到吴野老师在该报发的一首《慢慢地老》的诗，未几行写的特有感情：仰望星汉，俯听松涛，/ 生命之爱何止于道德意义的崇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在太阳月亮的美丽下面找一块靠垫；/ 中国梦，把晚年倚靠。
诗写出了超过80岁吴野的晚年心境，伟大的祖国始终在他的心中，不管他身居哪里。吴野老师，我盼望看，疫情过后，彩霞满天，我们相聚首钟山脚下。